

一切行动听党指挥

何欣禹

记得在中国美术馆看到过一幅名为《步调一致才能得胜利》的油画，画上画的是1928年4月3日，毛泽东同志站在湖南省桂东县沙田圩“三十六石丘”田边土台上，扳着指头向工农革命军和赤卫队员们讲解“三条纪律六项注意”的历史情景。“三条纪律六项注意”后来发展成为脍炙人口的“三大纪律八项注意”。但不不变的是，它们的第一条都强调“一切行动听指挥，步调一致才能得胜利”。

从革命战争时期到社会主义建设时期，直到今天，“一切行动听指挥”这一纪律要求一直发挥着重要作用。

在炮火纷飞的战争年代，军号就是命令，面对凶恶敌人，只要冲锋号吹响，英雄的战士便会奋勇向前。“一切行动听指挥”，让人民军队取得了一场场胜利。在本期所展示的文物中，不论是小英雄崔振芳的军号，还是《中国工农红军军号谱》，都是“一切行动听指挥”的证明。在那个通讯与计时设备奇缺的年代，嘹亮的军号声是发号施令的方式之一，也是战士们心中的“指挥棒”。军号怎么吹，部队就怎么做，军令怎么下，战斗就怎么打。可以说，军号是人民军队听党指挥、纪律严明、绝对忠诚的体现，号令既出，全党全军坚决执行。在一次次纪律严明的磨砺中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，由小到大、由弱到强，成长为无坚不摧的劲旅雄师。

一切行动听党指挥，是我们战胜一切困难的勇气和力量。不论是面对汹涌的长江全流域性洪水，还是突如其来的非典疫情和新冠肺炎疫情，共产党员响应党的号召，不畏艰险、冲锋在前。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培育的“一切行动听指挥”的好传统、好作风没有变。在这些突发灾难面前，全国上下一盘棋，汇聚起众志成城、同心协力的磅礴力量。

“加强纪律性，革命无不胜。”1948年，毛泽东在西柏坡给东北野战军负责人和各中央局、各前委负责同志发出的电报中，写下这样的话。回首百年峥嵘岁月，中国共产党正是由于制定了严格的纪律，才赢得人民的信任和支持。坚持“一切行动听指挥”，坚决服从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，是党和人民事业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的根本保证。

小英雄崔振芳的军号

樊双



这把军号，原收藏于八路军太行纪念馆，现陈列于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中，是小英雄司号员崔振芳在著名的黄崖洞保卫战中用过的军号。

军号高27厘米，喇叭直径11.1厘米，呈喇叭花状，手柄弯曲为耳形。这把曾参加过抗日战争的军号虽然残缺不全，有点变形，但却给人留下难忘的记忆。

今天在黄崖洞兵工厂旧址，矗立着小英雄崔振芳的雕像。崔振芳，山西洪洞县人。1937年参加八路军后，在八路军总部特务团任连部通信员。1940年被调到团部司号班学习司号和通信技术。后任三营七连司号员，奉命随部队进驻黄崖洞兵工厂正面的瓮窑。

黄崖洞地处太行大峡谷，地形险要，易守难攻，正是考虑到其隐蔽性和安全性，八路军副总参谋长将八路军的掌上明珠——黄崖洞兵工厂设在这里。

日军将黄崖洞兵工厂视为眼中钉。为了摧毁这座兵工厂，1941年11月9日，日军集结了5000余重兵，以“反转电击”战术向黎城以北黄崖洞、水腰地区进攻。八路军总部特务团凭险抗击，打退其10多次猛烈冲击。

11月11日拂晓，日军对总部特务团三营七连阵地发起偷袭，当日军距八路军阵地百米左右时，司号员崔振芳吹响了军号，八路军凭借天

这本特殊的文物，收藏在福建省宁化县革命纪念馆内。这是一本1932年印制的《中国工农红军军号谱》。

内页曲谱均采用五线谱，收集了红军生活、训练、作战及部队番号、职务、首长代号等曲谱340多首。

军号，好比号令部队的指挥密码。无论是作战、行军还是日常管理，司号员只要吹奏号谱，部队的千军万马都能变得井然有序。

战争年代，军队日常生活、训练、作战，基本都要靠号音指挥，从首长到新兵都必须熟记军号号谱。新兵入伍后，要进行背诵号谱的训练，什么是冲锋号？什么是集合号？什么是防空号？什么号是在叫连长……上百个号谱必须背得滚瓜烂熟。很难想象一个战士如果连起床、熄灯、吃饭和集合号都分不清，将是何等情形。

老红军张生荣回忆说，小小军号，学问可大着，一本厚厚的号谱本子，看完都要花好长时间。几百种号谱，全要

闻令而动 听令而行
红军军号号谱的故事

刘心闻



上图为《飞夺泸定桥》(油画)。
左图为《中国工农红军军号谱》。

刘国枢
资料图片

记得熟熟的。“那时没有电话，几个连分散在好几个山头上。前进、后退，左拐、右行，全靠号来指挥。吹错了，可是要死人的。”

在国防大学军事文化学院全军司号员培训班的课堂上，音乐老师刘保国正向学员们介绍红军时期少共国际师号谱的奥秘。刘保国用粉笔在黑板上写下一段红军号谱的内容。

“你们能想象的到吗？司号员只需吹出红军号谱上的这段旋律，就可以让少共国际师政委跑步到红一方面军司令部来？”

老师边讲述，边吹奏。

红军创建初期，部队沿用的是旧军队的号谱。由于号谱相同，敌我双方常常发生误会。1930年冬，第一次反“围剿”斗争胜利后，中国工农红军总部着手编写自己的号谱。1931年秋，红军总部正式颁发了新号谱。同年11月29日，中革军委发布《关于司号问题的通令》，要求红军各军团、各军的指挥员和司号员熟悉和掌握统一的号谱，以便全军统一号令行动。

换用新号谱后，红军可根据敌人的号音掌握他们在战场上的新动向，而敌

人对红军的行动却摸不着头脑，军事主动权便经常掌握在红军手里。

吹军号，既然可以用来识别友军，那么也可以用来迷惑敌军。军事上留下了不少军号迷惑敌军的传奇战例。

军号退敌的一个重要战例发生在“飞夺泸定桥”的行动中。

中革军委于1935年5月26日命令红一军团及主力在两天半内向泸定桥急进。红一军团将夺取泸定桥的任务交给了王开湘、杨成武领导的红4团。红4团沿着大渡河西岸向泸定桥一路飞奔，边走边打。沿途山路陡峭崎岖，危机四伏。

在红军向泸定桥奔袭的同时，国民党川军派出两个旅在大渡河东岸向泸定桥增援。双方隔河并行赛跑。入夜，双方都打着火把奔跑。川军发现了对岸的火龙，于是，隔江向对岸吹军号进行联络。杨成武听到对方的号音，赶紧叫司号兵联络。恰巧几天前一仗时，红4团缴获了敌人的号谱，司号员使用敌人的号谱回答敌人，说是自己人，是向泸定桥增援的部队，四川籍的同志和俘虏也吊起嗓子大声作答。川军一听是自己人，警惕性大大降低，隔江并排跑了一阵，他们跑累了，便吹号宿营休息。红4团抓住时机，加速前进，先于敌人赶到了泸定桥西。

红军之所以能在大渡河畔绝处逢生，没有成为“石达开第二”，除了有中革军委的正确领导和红军顽强的战斗精神外，也得益于红军将士巧妙利用军号退敌，为飞夺泸定桥赢得了时间。

中央红军全部渡过大渡河后，来到天全附近。一天，红军总司令朱德带着几个参谋到一支部队检查工作。当他们接近紫金镇时，被国民党川军第71团发现。200多名川军紧追朱德一行，双方距离最近时仅200多米，情况万分危急。这时，从山上突然传来了川军的军号声，军号告诉他们追击的是自己人。川军士兵听到号声，立即停止追击，掉头归队。就这样，红军又一次利用军号巧妙躲过了敌人的追击。

考虑到军号在提振军心士气方面的独特作用，为强化号令意识、传承红色基因、推进部队正规化建设，2018年10月1日，中国人民解放军恢复播放作息号，2019年8月1日，全军正式施行新的司号制度。恢复司号制度，更重要的是强化闻令而动、听令而行的战斗作风，发扬英勇顽强、不怕牺牲的战斗精神。

按新的司号制度规定，原有的109种号谱精简优化为作息类号谱11个，行动类号谱5个，仪式类号谱5个。

(作者系国防大学军事文化学院教师)

一张俄式毛毯，收藏在平津战役纪念馆中。这是一条颜色黯淡、以绿色为主的纯毛毛毯。就是这件普普通通的毛毯，见证了我军军史上一个不平凡的民主决策。

1948年11月29日，三大战役之中的平津战役打响。12月，我东北野战军挥师入关，与华北野战军共同发起平津战役。中央军委制定了“先打两头，后取中间”的战役原则，两头分别是塘沽、张家口，这样可切断国民党傅作义集团逃跑的去路，便于将其分割包围

12月21日，军委电示：“我军应不惜疲劳，争取于尽可能迅速的时间歼灭塘沽敌人。”

12月22日下午，担任主攻任务的第44军第131师以一个营作试探性进攻。10分钟后，占领了一小段滩地，但伤亡过半。邓华当机立断命令停止攻击。

晚上，邓华反复思考：攻克塘沽这招棋该怎么下？塘沽地形很不利于进攻，强攻伤亡过大，还歼灭不了敌人，而敌人军舰又摆在海上，无法绕到敌后包围敌人；如果平推，只会把敌人逼上

就合盖这条毛毯一起休息。经过现场调研，集体商谈，刘亚楼等人也得出了与邓华同样的结论。

这时，恰逢有起义倾向的国民党军将领侯镜如捎话给刘亚楼，如先打塘沽的话，解放军会遭到来自海上的国民党军舰和陆上天津驻军的火力夹攻，即便赢了也不合算，因塘沽守敌可从海上逃走。

综合这些研判和情报，4人联名向中央军委写了“缓攻塘沽、先打天津”的报告。

12月29日11时，毛泽东代表中央

毛毯上的建言

刘波



在平津地区。

东北野战军首长决定，由第44军司令员邓华统一指挥第44军等3个军并附1个师，首先攻击塘沽、大沽之敌，截断平津之敌从海上东逃的去路。

邓华受此重任后，即于12月16日率部来到了塘沽以北40里的北塘小镇。他亲往前线对地形、敌情等进行实地侦察。他发现，这里是一马平川的盐滩地，敌军层层设防，工事密布。我进攻部队进入盐滩地区，没有任何物体可作掩蔽，将完全暴露在敌炮兵和海上舰炮组成的密集火力网之中，伤亡势必极其惨重。

军舰，从海上逃走。到底怎样打，才能避免大的伤亡，以较小的代价去争取更大的胜利？

邓华将自己的想法向东野总部发电报，建言：攻塘沽不如打天津对我有利，拿下了天津，也就封锁了平津敌人的海上逃路。

事关重大，东野首长派出天津战役总司令、东野参谋长刘亚楼等人亲自前往塘沽验证邓华的建议。邓华陪同刘亚楼、肖华、吴福善等人，前往海堤、盐田、河汉一带勘察地形，研究作战方案。一直工作到深夜，时值隆冬，他们

军委复电：“决定放弃攻击两沽计划，集中5个纵队（军）夺取天津是完全正确的。”转而调集5个军22个师和特种兵部队，以具有绝对优势的兵力和兵器夺取天津。

1949年1月14日，东北野战军向天津发起总攻，29小时内，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攻克天津，天津解放后，塘沽守敌5万余人，不战而逃，塘沽随即获得解放。

(作者系国防大学军事文化学院教师)
上图：《平津战役·会师金汤桥》(油画) 孙立新 白展望 龚红



国家文物局特别支持